

思想與社會
Logos & Polis

研究系列

上帝与罗马

奥利金与早期基督教的 宗教－政治革命



吴功青 著



上海三联书店

LOGOS & POLIS

非外借

上帝与罗马

奥利金与早期基督教的 宗教－政治革命

吴功青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帝与罗马：奥利金与早期基督教的宗教-政治革命/吴功青
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 2

(思想与社会)

ISBN 978 - 7 - 5426 - 6216 - 3

I. ①上… II. ①吴… III. ①罗马帝国—基督教史—研究
IV. ①B979.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26950 号

上帝与罗马：奥利金与早期基督教的宗教-政治革命

著 者 / 吴功青

责任编辑 / 黄 韬

装帧设计 / 徐 徐

监 制 / 姚 军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邮购电话 / 021 - 22895557

印 刷 /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8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 × 960 1/16

字 数 / 200 千字

印 张 / 16.25

书 号 / ISBN 978 - 7 - 5426 - 6216 - 3/K · 559

定 价 / 48.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 - 37910000

上帝与罗马

奥利金与早期基督教的
宗教－政治革命

编委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刘训练 孙向晨 任军锋

吴 飞 李 猛 林 晖

崇 明 渠敬东 黄 韬

本书为中国人民大学决策咨询及预研委托项目后期资助项目（项目号：17XNQ007）的阶段性成果。

总 序

λόγος 和 πόλις 是古代希腊人理解人的自然的两个出发点。人要活着,就必须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中;在共同体中,人不仅能活下来,还能活得好;而在所有共同体中,城邦最重要,因为城邦规定的不是一时的好处,而是人整个生活的好坏;人只有在城邦这个政治共同体中才有可能成全人的天性。在这个意义上,人是政治的动物。然而,所有人天性上都想要知道,学习对他们来说是最快乐的事情;所以,人要活得好,不仅要过得好,还要看到这种好;人要知道他的生活是不是好的,为什么是好的,要讲出好的道理;于是,政治共同体对人的整个生活的规定,必然指向这种生活方式的根基和目的,要求理解包括人在内的整个自然秩序的本原。在这个意义上,人是讲理的动物。自从古代希腊以来,人生活的基本共同体经历了从“城邦”(πόλις)到“社会”(societas)与现代“国家”(stato)的不同形式;伴随这种转变,人理解和表达自身生活的理性也先后面对“自然”(φύσις)、“上帝”(deus)与“我思”(cogito)的不同困难。然而,思想与社会,作为人的根本处境的双重规定,始终是人的幸福生活不可逃避的问题。

不过,在希腊人看来,人的这种命运,并非所有人的命运。野蛮人,不仅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共同体,更重要的是,他们不能正确地说话,讲不出他们生活的道理。政治和理性作为人的处境的双重规定,通过特殊的政治生活与其道理之间的内在关联和微妙张力,恰恰构成了西方传统的根本动力,是西方的历史命运。当西方的历史命运成为现代性的传统,这个共同体为自己生活讲出的道理,逐渐要求越来越多的社会在它的道理面前衡量他们生活的好坏。幻想包容越来越多的社会的思想,注定是越来越少的生活。在将越来越多的生活变

成尾随者时，自身也成了尾随者。西方的现代性传统，在思想和社会上，面临着摧毁自身传统的危险。现代中国在思想和社会上的困境，正是现代性的根本问题。

对于中国人来说，现代性的处境意味着我们必须正视渗透在我们自己的思想与社会中的这一西方历史命运。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同时担负着西方历史命运的外来危险和自身历史传统的内在困难。一旦我们惧怕正视自己的命运带来的不安，到别人的命运中去寻求安全，或者当我们躲进自己的历史，回避我们的现在要面对的危险，听不见自己传统令人困扰的问题，在我们手中，两个传统就同时荒废了。社会敌视思想，思想藐视社会，好还是不好，成了我们活着无法面对的问题。如果我们不想尾随西方的历史命运，让它成为我们的未来，我们就必须让它成为我们造就自己历史命运的传统；如果我们不想窒息自身的历史传统，让它只停留在我们的过去，我们就需要借助另一个传统，思考我们自身的困难，面对我们现在的危机，从而造就中国人的历史命运。

“维天之命，於穆不已。”任何活的思想，都必定是在这个社会的生活之中仍然活着的，仍然说话的传统。《思想与社会》丛书的使命，就是召唤我们的两个传统，让它们重新开口说话，用我们的话来说，面对我们说话，为我们说话。传统是希腊的鬼魂，要靠活的血来喂养，才能说话。否则海伦的美也不过是沉默的幻影。而中国思想的任务，就是用我们的血气，滋养我们的传统，让它们重新讲出我们生活的道理。“终始惟一，时乃日新。”只有日新的传统，才有止于至善的生活。《思想与社会》丛书，是正在形成的现代中国传统的一部分，它要造就活的思想，和活着的中国人一起思考，为什么中国人的生活是好的生活。

序一： 文明的裂缝

吴 飞

1999年暑假，在去美国读书之前的一个多月，我到杭州拜访章雪富兄，他向我讲起来当时正在研究的奥利金。我虽然听得糊里糊涂，却肃然起敬，当然首先是对章雪富的，然后才是对奥利金的。这是我第一次对奥利金有了些感觉。

几年之后，在开始翻译和研究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的时候，在哈佛大学神学院的图书馆里，我翻看了前尼西亚教父的著作集，特别是东方教父。和我已经比较熟悉的奥古斯丁相比，他们的想法真是五花八门，匪夷所思，这时候才明白了，为什么一些博学的罗马人那么排斥基督教，而奥古斯丁的工作真是化腐朽为神奇。但在诸多的希腊教父当中，真正能够让人有兴致读进去的，大概就只有奥利金了。和其他的东方教父相比，奥利金哲学之深邃、运思之巧妙、体系之完整，确实已有天壤之别。当初雪富兄为什么花那么大力气研究这个人，我现在逐渐有了一些感觉。后来听一位教授谈到，早期东方教父的工作，就好像是在造一个足球，而奥利金的工作就是第一个拿到了这个造好的足球，但他并没有真正玩起这个球来，他只是一个二传手，是到了拉丁教父的手中，才真正用这个球打起了比赛。就蔚为大观的基督教思想而言，这个比喻基本上说出了奥利金在基督教思想体系形成过程中的位置。拉丁教父思想集大成于奥古斯丁，其后经过阿奎那的重大修正，再到宗教改革时路德、加尔文的重新表述，乃至自由神学和新正统神学的基本思想，虽然其间有过不少的改变，但基本都在同样的问题

域下运思和讨论,没有大的差别,对于创世—原罪—拯救—末世这一基本模式没有根本的分歧。但若是回溯到东方教父,我们会觉得这似乎根本不是一个宗教,后来许多被认为理所当然的前提完全没有被接受,后世不断争论的许多问题还根本没有进入视野,而大家所争论的,许多竟然是后世已经完全消失的问题。

成熟的基督教思想对后来欧洲乃至整个世界文明形态的影响,我们现在已经比较熟悉了,熟悉得常常忘了,这其实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思想体系;从今天或现代回溯历史,我们也往往会想当然地认为,从希腊罗马到基督教,似乎是自然而然发展过来的,奥古斯丁以后的基督教,就是西方思想史一脉发展下来的形态。但文明史的发展远非如此简单,希腊与希伯来文明的相遇,是人类文明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两种文明形态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并不是轻而易举就能融合到一起的,其间不知有多少转折点,有多少偶然性,有多少被埋没了的可能性与思想生长点,而且这些没有充分发展的可能性未必就不如后来定为正统的那种可能性深刻与系统。后来的拜占庭帝国和东正教,就是这些没有被定为正统的可能性的遗存,但远非它的全部可能形态。文明相遇时的震撼,就如同地震之时的震撼,地震纵然可怕,却可以让我们有可能看到地壳裂缝,有可能更本真地了解脚下的大地,而那个时期文明转型就如同一场地震,震出了文明的裂缝,也提供了丰富的思考点。成熟时期的文明形态虽然富丽堂皇,却把许多本质的东西掩盖住了,似乎这些本质都不需要研究,我们只要使用、欣赏就够了;但在文明的裂缝中,许多不言自明的前提遭到了质疑,许多更原始的思考成为新的命题,有可能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文明的实质含义。如果只关注文明融合之后的成熟形态,而不能认真看待完成融合之前的文化差异、长期争斗,就会错失许多深入实质问题的机会,而无法了解圆融体系何以圆融——就像读柏拉图对话的时候,读者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不加思考地接受苏格拉底的结论,而不认真看待被苏格拉底反驳掉的那些观点,结果只记住了一些结论,而无法领略思考与对话的真正力量。阅读奥利金和其他早期教父,既可以帮我们看到基督教思想

体系形成过程，也可以将这些可能性充分展现出来，从而更丰富、全面、动态地把握西方文明的总体形态。

继雪富兄开创性的奥利金与东方教父研究之后，吴功青这本《上帝与罗马》是又一部研究奥利金的中文力作。但他最关心的却不是哲学界和宗教学界更熟悉的哲学与神学问题，而是《驳凯尔苏斯》中所谈到的政治哲学。就像许多批驳基督教的著作一样，凯尔苏斯的《真道》早已佚失，我们只能通过奥利金批驳时的引用来窥见凯尔苏斯的某些观点。一个粗心的读者很可能只能读出奥利金的学说来，而无法认真还原凯尔苏斯本人的观点，无法认真对待凯尔苏斯，也无法认真对待早期教父筚路蓝缕的辛苦。但吴功青没有陷入这个问题，而是尽可能通过奥利金的批评，呈现出争论双方各自的学说，这是相当难能可贵的。由于此书直接从奥利金与凯尔苏斯之间的争论入手，其中所力图展现的，是希腊罗马文明遭遇基督教文明时的短兵相接，使我们有可能更真切地看到文明裂缝当中的刀光剑影。奥利金虽然处在基督教思想尚未最终成熟的时候，但他毕竟在艰苦的争论与论战之后，已经完成了一次思想整合，如果我们只是关注其相对更成型的哲学形态的结构与命题，同样会忽略奥利金的意义。研究奥利金和其他早期教父，最大的意义就在于，通过文明争论的横切面，将后人所不易想象的理论困难尽可能复原，从而让我们能够更真切而鲜活地感受文明相遇的困难和力量。因此，对早期教父的研究，其时代语境非常重要，而这正是吴功青此书最值得肯定的地方。

作为东方教父中最杰出的一位代表，奥利金主动选择批驳七十年前的凯尔苏斯，颇类似于后来的洛克批驳菲尔默，看上去是时代错位的关公战秦琼，实则有着相当重要的历史意义与思想意义。在对基督教的诸多批判者当中，凯尔苏斯是非常有力的一个；而且就当时而言，基督教思想尚处于相当粗糙的阶段，在博学的凯尔苏斯的猛烈攻击面前，是不容易为自己辩护的。因而，奥利金的反驳并非简单的护教，而是在护教过程中进行理论建构。这样我们也就可以理解，奥利金之所以一定要拉凯尔苏斯出来批驳，正是因为，凯尔苏斯批评基督教时所

说的那些问题，是绕不过去的，不会随着凯尔苏斯的去世而被遗忘。如果基督教不能正面回应这些问题，就不可能真正确立自己的地位。因此，奥利金对凯尔苏斯的批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护教著作，而有着更值得关注的理论与历史意义。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会有人认为，《驳凯尔苏斯》是仅次于《上帝之城》的重要著作，尽管它的思想意义最终为后者所取代，但吴功青此书所做的，就是帮助我们更细更慢地回放文明相遇的每个细节与每个转折。

双方争论的一个焦点是如何看待罗马帝国，但吴功青没有把这本书写成一个简单的罗马帝国形象研究，他引用学者 Peterson 的话说：“（基督教）一神论是罗马帝国的形而上学结果。”这句简洁的概括却将一神论、罗马帝国、形而上学三个核心概念钮合到了一起，神学、政治哲学、哲学三种视角息息相关，相互作用，相互牵连，共同完成了当时的文明转型——吴功青充分注意到了这些复杂面向，虽然尚未将其丰富性完全展示出来。凯尔苏斯与奥利金多个层面的争论也应该从这三个方面来讨论，而基督教何以能与罗马文明发生激烈的冲突，继而又落地生根，需要从这样的综合视角来看，而奥利金所面对的思想困难，他所做的妥协、迂回、辩护、体系建构，也都需要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也由此才能理解，像他这样伟大的教父，不会像早期狂热的殉道者那样与罗马帝国简单对抗，而是试图在基督教思想允许的范围内接纳罗马帝国，甚至让基督徒为罗马帝国而战，但对为帝国而战的理解又形成自己的独特诠释方式。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奥利金殚精竭虑的思索与修改，并藉此触摸文明转型的律动，也才能够理解基督教与罗马帝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早在基督教尚未被君士坦丁接纳的时候，奥利金这样富有远见的神学家就已经放弃了简单护教的立场，而开始思考如何建构一个基督教帝国的问题。也只有他迈出的这重要一步，才为后来优西比乌的历史哲学、奥古斯丁的两城说做出了准备。正是他们做出的这些努力，才使基督徒不再仅仅以反抗者和护教者的态度面对罗马帝国，而成为一种更深刻的文明再造。奥利金为弥合基督教与罗马帝国而构想出的一些理论态度，经过了君士坦

丁的实践、优西比乌的发展，到奥古斯丁手中就被超越了，奥古斯丁以后最关心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奥利金最关心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奥利金并未参与以后的那场足球比赛。但是，奥利金思考的意义仍然在深刻地影响着后世，他许多独特的问题甚至在以后的基督教历史中还会重新出现。这也是我们必须重视奥利金这个必定被超越的教父的一个原因。对奥利金政教关系的研究，应该是吴功青此书中雄心最大、最有见识的部分，当然，也有一些问题的讨论可以挖掘得更深一些。书中对多神教与一神教的讨论，以及罗马与被征服各民族的关系，有着相当重要的理论意义，但仅仅停留于相对主义和普遍主义之间的争论，就显得有些单薄。希望作者在将来的研究中能够有更丰富的展开，更圆融地将神学、政治哲学、哲学的不同视角熔为一炉。

吴功青是我最早带的硕士生之一。来北大学习之前，他的专业本来是法律，同时又是一个小有名气的诗人。经过几年的哲学学习，诗人的狂放气质渐渐消退，慢慢变成了一个刚毅木讷的小学究。后来，他到意大利博洛尼亚去读书，在意大利不仅面对了意料之中的文化冲突，而且经过了未曾想象的困难，甚至包括导师的去世。对吴功青来说，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经历，无论就学术还是就生活而言。正是在这个磕磕碰碰的艰难时期，他开始关注奥利金，开始思考文明相遇的诸多问题。

深入文明相遇的律动，并不仅仅是为了对基督教有更深入和丰富的了解，而是要看到，我们往往更喜欢看的成熟思想体系总是过于圆融光滑，找不到一个可以深入其中的裂缝，无法将它还原为生活本身，因而也就往往无助于对生活的理解和思考。文明相遇之时的张力与冲突，一代代思想者前赴后继的试错，才最终成就了那个圆融的伟大体系。希腊罗马面对基督教，就是这样的一次文明相遇；儒学面对佛学，也是同样丰富而伟大的文明相遇；今日中西文明的相遇，则是第三次伟大文明的相遇，其复杂与震撼又超过前面的两次文明相遇，人类生活中的种种原初问题都会出人意料地涌现出来，文明的裂缝使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但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任何一种简单化

的解决方式，可能都会错失问题的根本。所以，我们的许多努力，很可能都是试错，但我们所捕捉到的每一个矛盾、每一对张力，都很可能会是重要思想的生长点。奥利金所真正教给我们的，或许正是如何在文明的裂缝中去捕捉最根本的问题，在成就一个新的文明传统的同时，使自己最深地进入到文明的传统之中。谨以此与作者共勉！

戊戌早春序于仰昆室

序二

章雪富

奥利金(Origen)是基督教的大思想家,主要活跃于公元三世纪。他不仅是公元三世纪基督教思想界最重要的人物,还引发了整个四世纪基督教世界的神学思想之争,是四世纪基督教世界不在场的“在场”。公元四世纪和五世纪常被称为古代基督教思想的黄金时期,这时期基督教的代表性思想家,无论正统的还是异端的,都与奥利金有着深厚的渊源。古代基督教最大的异端阿里乌主义、反阿里乌主义的前期代表人物亚历山大里亚的主教阿他那修、反新阿里乌主义的后期代表人物卡帕多西亚教父,还有称奥利金为异端的耶柔米和包括某种程度上的奥古斯丁,都在不同方面——例如神学进路和解经方法等——与奥利金存在师承关系。在基督教思想中上,无论正统派代表还是被称为异端的思想家都深受同一位思想家影响这种事例,恐怕是不多见的,奥利金则是其中之一。

由于奥利金思想所引发的争议以及其思想本身的可争议性,他在中古时期甚至被列为思想可疑的人士,虽然最终免于异端之责罚,但是在传统基督教思想上名声不佳。在现代西方学术界,奥利金则是除奥古斯丁之外被研究得最多的早期基督教思想家。现代西方学者大概本着重新发现奥利金的兴趣,也带着现代人的开放态度为奥利金“抱打不平”,发表了不少对其进行价值重估的作品。不过,现代西方学者的研究大多侧重于奥利金的知识世界,主要着眼于其神学思想的知识内容,以期透过重新发现奥利金,为三到四世纪基督教运动重新

确定框架，并以此理解希腊文化与基督教思想关系的走向。

但是，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吴功青博士的这本研究奥利金的书，却为我们开启了新的研究路径。本书是一部从新的角度理解奥利金与古代思想世界，甚至与现代世界之关系的作品。与西方学者侧重于奥利金的知识世界不同，功青师兄把奥利金的神学系统，包括有关基督信仰的各种知识形式融会于政治思想的分析之中，使用一种考古学技术呈现信仰知识背后的政治原理，把学者们通常视之为客观知识的研究对象，诠释为信仰和社会活动关联的主观知识，并与公元一世纪以降西方古代社会的革新和变化趋势相连接，将奥利金思想研究置身于古代世界的变迁，从一个思想家所基于的古代社会批判和辩护中，理解中古时期的政治革新和妥协过程，让人耳目一新。

为呈现奥利金思想的政治思想层垒以及他与古代政治社会的关系，功青师兄主要以奥利金的《驳凯尔苏斯》为焦点。《驳凯尔苏斯》这本书常被称誉为古代基督教护教著作中除奥古斯丁《上帝之城》之外最重要的护教作品，可见其影响之巨。和《上帝之城》一样，《驳凯尔苏斯》是一部整个古代基督教辩护传统持续累积并达到成熟的伟大作品。其内容包罗万象，堪称基督教和希腊文化交锋的全记录。然而学者们通常对《驳凯尔苏斯》的研究也仅限于文化冲突以及哲学派别争论的议题，功青师兄则另辟蹊径，透过本书的文化批判呈现政治规范之争和社会意识的转移。

功青师兄有关《驳凯尔苏斯》一书的研究，颇有引导古代基督教思想研究新知和新思的份量。功青有关《驳凯尔苏斯》这部护教作品的研究另开思路，足见其学术眼光的独到；他有关《驳凯尔苏斯》的研究不仅平视奥利金立场，而且努力复原凯尔苏斯本人的论辩，可见其学术研究之严格；他把《驳凯尔苏斯》放在现当代价值语境下加以释读，则足见其文化和价值的敏感性。虽然任何卓越的研究都会引发很多可争论之处，但是争论恰恰是学术研究重要的价值之一。我相信这部书会引发更多人对奥利金乃至教父学的兴趣。

功青嘱我写序，自问力所不逮，谨此塞责，敬请功青并读者诸君原谅！

目 录

导论：奥利金、早期基督教与罗马帝国	1
第一章 基督教的自然法革命	1
第二章 法律、习俗与诸神	48
第三章 新旧宗教之争	84
第四章 基督教帝国的兴衰	138
结语：习俗、道理与政治共同体	185
奥利金的自由意志学说——以“形质论”为中心	191
参考文献	205
后记	213